書名:《臺灣女性研究の挑戦》

編者:野村鮎子、成田靜香

出版:京都,人文書院

出版日期:2010年4月

頁數:365頁

以20世紀60年代美國新女權運動的開展為肇端,對於女性的關注逐步上升到學術研究層面,女性研究不但在美國、加拿大、西歐諸國迅速勃興,也波及到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地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性別視角伴隨著婦女研究的深入拓展廣為傳播,由邊緣進入主流,成為‘顯學’甚至‘熱學’”。^[1]本書出版的契機源自日本關西中國女性史研究會主辦的“臺灣女性研究論壇”,由2007至2009,歷時兩年,參加者皆為活躍在臺灣第一線的性別學研究者、社會活動家或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2]收錄的九篇論文中除少數根據已發表論文修改增刪外,其餘皆是專門為該論壇撰寫并首次刊發。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每篇論文之後附有論文翻譯者撰寫的“解題”。執筆者作為相同研究領域的日本學者,不局限於簡單的評論和解說,而是以學術敏感性和旁觀者的視角自出機杼,彌補了本土學者進行本土研究時的盲點,展現了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日本在女性問題上存在的共通與相異,也在異文化的碰撞中激蕩出靈感的火花。

本書由“變革の道程”、“社会進出の道程”、“女たちの聲を聴く”三部分構成,既體現了歷史演進的縱向延續性,又反映出群體與個體、特殊與普遍之間聯繫轉換的橫向延展性。

第一部分從宏觀角度系統展示了臺灣存在的女性問題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革。在《“不孝”的權利:臺灣女性繼承的兩難

困境》³⁾中,陳昭如氏圍繞財產利益的分配與爭奪,揭示了其中隱藏的性別秩序的定義權角逐(頁13《指臺灣女性研究の排戰》,下同),並對一直以來將放棄繼承權的女兒視為無助的受害者或順從的孝女、將爭奪繼承權的女兒視為自主的行動者或不孝的惡女這一簡單的二元對立觀點進行了重新審視。林香奈氏在解題《脫性別化的法律是否能對抗性差別:對女兒繼承中潛在的性別不平等提出質問》中,依據日本及中國臺灣的先行研究,對臺灣民法中繼承權修正的背景和與之相關的婦女運動進行了補充說明。在《臺灣女性勞動力與職場的性別不平等》中,張晉芬氏概述了從清朝統治期、日本殖民國期直至現在臺灣女性的勞動史,回顧了《兩性工作平等法》(2002年頒布,2008修正改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經過婦運團體的努力最終實施的過程。大平幸代氏的解題《改善女性就勞環境:與張晉芬氏談臺灣職業女性的現狀與課題》以訪談的方式比較了日本和中國臺灣職業女性所共同面臨的結婚、生育、性別歧視等諸多問題,在探尋解決策略的過程中進行了饒有興味的對照反思。作為馬英九擢選的臺北市公務員訓練中心主任,顧燕翎氏結合切身體會,在《女性主義體制內改革:臺北市女性權益保障辦法制定之過程及檢討》中剖析了婦女運動與國家或官僚權力系統之間的角力,根據女性政策與大選的關聯論述了當前臺灣女性問題的政治化(頁90)。洪郁如氏的解題《臺灣的女性主義官僚和性別主流化》則將臺灣女性主義官僚的出現及其特徵置於國內政治、國際環境的背景下,結合民族的、個體的因素進行了思考。范情氏的《臺灣婦女運動歷程》回顧了自日本統治期直到現在臺灣婦女運動的過程和流變,竹內理樺氏則在解題《與政治民主化并行:臺灣婦女運動的步伐》中以局外人的視角客觀闡述了近年臺灣各黨派出於政治目的對婦女運動的介入,分析了與政治密接造成的婦女運動的複雜化。

第二部分以發展的眼光追溯了女性不斷拓展自身活動空

間、逐步融入社會的進程。游鑑明氏的《日本殖民體制與臺灣女性醫事人員》依據當時的報刊雜誌、乃至同學會的統計數據，輔以豐富的採訪記錄，論述了日本統治下臺灣女性醫務工作者的養成。坪田中西美貴氏的解題《臺灣女性的近代體驗及生活方式的變化》則從女性的放足、入學、就業等方面，闡述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策對臺灣新女性出現的影響。在《出家入世：戰後臺灣女性僧侶的生存方式》中，李玉珍氏根據臺灣比丘尼高學歷化的現狀，透過她們所展現出的“活躍的社會參與力和宗教領導力”考量女性“出家”的真正動機（頁215），重新審視了戰後臺灣社會變遷的文化與宗教意義。成田靜香氏在解題《戰後臺灣佛教界的先驅女性》中介紹了留學日本修習佛教的臺灣女尼妙慧的生平，並將其定義為臺灣佛教界“新女性”的先驅（頁243）。對原住民女性的關注在臺灣女性研究中一直相對薄弱，賴淑娟氏的《部落與都會之間：臺灣原住民婦女世代之間經濟活動的轉化》揭示了涌入都市的原住民女性多半從事低報酬、低發展潛力的邊緣性勞動的現狀，警示了由此造成的家庭分裂及對下一代的不良影響。野村鮎子氏在解題《可視與不可視之間：原住民族女性的現階段課題》中，指出了原住民女性研究處於“原住民族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夾縫中、易被忽視的現狀，繼而根據原住民女性問題的多元化中濃縮的臺灣女性問題的多元化，指明了原住民女性研究的意義所在。

與前兩部分相比，第三部分傾聽女性的聲音，更加注重微觀與個體的考察。吳燕秋氏的《戰後臺灣女性墮胎心態史（1945—1984）》以女性主義的觀點解讀了戰後臺灣女性的墮胎心態及其中隱含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和日本殖民國期法律的影響，根據相關報導總結了輿論將墮胎與性污名等同的傾向，探討了“優生保健法”頒布的背景和該法律可能造成的諸如變相擴大了丈夫對妻子身體的控制權等方面的弊端。中山文氏在解題《臺灣、中國大陸、日本墮胎心態比較》中對比了三地墮胎歷史

和現狀中存在的共同點和差異,探討了女性墮胎心態與社會體制的關聯。邱貴芬氏在《女性史研究的方法:以一部臺灣紀錄片為例》中,圍繞臺灣當代的女性紀錄片《消失的王國——拱樂社》,通過訪談過程中社員的回憶對拍攝者試圖塑造拱樂社創辦人陳澄三英雄形象這一本意造成的衝擊,探討了“底層民衆發聲”的問題。田村容子氏的解題《當“底層民衆”敘述/欺騙的時候:在臺灣女性史研究中使用紀錄片的可能性》探討了“敘述者”與“被敘述者”主客雙方的可逆性,即一貫處於被敘述位置的底層民衆一旦獲得話語權,則很有可能對原來的主流和權威敘述造成衝擊。

日本女性學研究者竹中信子曾經在著作中引用歌德的話:“瞭解女性才能瞭解歷史的真實,要好好瞭解一個時代,必須好好調查那個時代的女性。”^[4]然而,女性在歷史中長期處於“缺席”和“失語”的狀態,相關資料不是殘缺不全,就是含混曖昧、甚至歪曲歧誤。臺灣將這種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況稱為“羅生門”,詞源是黑澤明執導的同名電影。有趣的是,口語中與臺灣“羅生門”一詞含義相同的是“藪の中”(芥川龍之介小說,黑澤明執導的“羅生門”的原形),而“羅生門”一詞於日本人而言指代的是芥川龍之介的另一部同名短篇小說,與在臺灣的含義大相徑庭。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文化對臺灣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相同文化在不同領域傳播中的變遷。而這部經由日本學者編譯評介的著作,與純粹的臺灣女性研究相比,也包含了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產生的獨到之處。

鑒於臺灣女性史及性別研究日語文獻的匱乏,臺日雙方曾合作編寫了《臺灣女性史入門》(臺灣女性史入門編纂委員會,京都:人文書院,2008年),本書是該書的拓展和深化,執筆者、翻譯者的十九人中,有十七人參與了《臺灣女性史入門》的編寫。在前書知識普及的基礎上,本書以新銳的觀點和實證的精神探討了臺灣社會政治中與女性息息相關的諸多問題。編者在

《序言》中提到，之所以將本書命名為“挑戰”，不但象徵著如今活躍於第一線的學者對臺灣女性研究作出的新嘗試，也蘊含著對後繼者的殷切期望。

“藪の中”一詞日語的本意為雜草亂樹叢中，用以比喻紛紜複雜、真假莫辨。如何在女性研究的紛繁蕪雜中篳路藍縷、釐清諸相、披沙揀金，如何跳出“身在此山中”的局限、通過與異文化的接觸以更宏觀和客觀的角度審視和反思本土文化，這有待于新一代研究者的新一輪“挑戰”。

日本國立奈良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博士 喬玉鈺

注釋：

- [1] 李小江著《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頁2。
- [2] 女性主義者（Feminist）與官僚主義者（Bureaucrat）的合成語，在澳大利亞女性主義運動中生成的概念。參見田中洋美〈ステイト・フェミニズムと女性官僚：女性官僚はフェモクラットか〉，日本《國際ジェンダー學會志》第六號（2008年），頁150。
- [3] 論文標題參考了執筆者中文版原作，解題標題為筆者根據日語翻譯，下同。
- [4] 竹中信子著《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東京：田畑書店，1995年），《序》，頁10。